

茶马古道

跨越巅峰的生活



云南省商务厅百年滇商丛书编委会

熊清华 主编

茶马古道

木霁弘 凌文锋 王婧婧 木业彭 著

卷十六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茶马古道

木霁弘 凌文锋 王婧婧 木业彭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马古道 / 木霁弘, 凌文峰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1

(百年滇商丛书)

ISBN 978-7-222-11566-8

I. ①茶… II. ①木… ②凌… III. ①古道—研究—西南地区 IV. ①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1415号

责任编辑: 王曦云 尹杰

封面设计: 王曦云

装帧设计: 钊祚伟 李蕾

责任校对: 骆魏 王艺蓉

责任印制: 陆卫华

书 名	茶马古道
作 者	木霁弘 凌文峰 王婧婧 木业彭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x1092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153.5千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1566-8
定 价	66.00元

云南省商务厅

百年滇商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熊清华

编 委 杜 勇 李极明 王开良 杨 慧

朱晓阳 赵 平 王建伟 孙 燕

朱 非 杜俊军 马永福 周学文

林超民（特聘） 木霁弘（特聘）

图 片 木霁弘 凌文锋 王婧婧 木业彭

总序



回望和弘扬百年滇商的宝贵遗产

云南省商务厅厅长
经济学研究员

熊清华

1840—1940 年的一百年间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内在资本要素的发育，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荡。就其原因来讲，外因和内因都很重要，它们相互碰撞和新生。外力的冲击加速了内部的变化，这些变化为商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的连锁反应，如户籍管理制度的弱化、西学东渐、工具时代的技术进步、交通条件的改善等因素，为中国各地民间商业活动的复兴提供了条件、空间和舞台。在这个大时代，云南的商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与世界息息相关的冲击和震荡，一批影响深远的商人和商帮在这时期脱颖而出，一系列云南的品牌也在这期间诞生、发展和壮大，相应的商业文化、理念、精神也相伴而生。对“百年滇商”的梳理、书写与重构，实际上就是通过对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的一个重要侧面的回望，从而把滇商文明挖掘出来、传承下去。

相对于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核心区域而言，云南是边疆，曾是蛮荒和落后的代名词，但是，另一面的价值则在于云南不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地缘价值，往南可通东南亚，往西可通南亚，往北、往东可接中国腹地。从文化地图上讲，云南还地处汉文化和印度文化之间的



通道上，而这两个古老的文明在自然资源及产品上有很多互补的地方；由于地利之便，云南的商人与印度、越南、缅甸等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时间要远远早于中原地区。这些商贸往来不仅带来了物资的流通，也带来了文化的交流。这个视角聚焦之下的云南代表的则是开放与前沿。回顾 1840—1940 年间云南商贸的发展，可以更清楚地探究云南所具有的这种双重性。

凡到过云南的人都知道，云南境内山多路险，地形错综复杂，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商业运输几乎全靠人畜之力，加之云南盛产良马，于是马帮便成为最方便、最经济的运输形式。云南特有的茶叶、盐巴、烟草、玉石就是靠这样的形式运输出去与市场消费连接的。与平原地区相对先进的运输形式相比，这无疑是一种低效率的运输形式，带来的利润也是如此，无法选择其最大化。而另一方面，这种运输方式也成就了云南许多著名的独特商帮，成就了云南商人吃苦耐劳、笃守信誉的优良品格。这些古道虽然早已冷清，马帮铃声已经远去，但是沿途高山河谷打磨出来的云南商人的宝贵精神至今犹存，尘封而不失光彩。

19 世纪末，是一个结束与开始、发展与扬弃的时代。1887 年，蒙自开辟为云南对外开放的商埠，1889 年，蒙自海关落成并正式开关，成为云南的第一个海关；1910 年，滇越铁路建成通车，把云南的河口、蒙自、昆明三个通商口岸连在一起，于是，云南 80% 以上的进口物资便通过滇越铁路在蒙自转运。另一方面，在蒙自开关后，洋纱、布匹、日用百货等进口商品大举进入，进口大增，全省 21 个府厅中有 20 个府厅、93 个县，以及贵州、广西、四川、湖南都从蒙自口岸进口商品以满足市场。滇越铁路是云南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的第一条国际铁路，它拉开了云南的近代化序幕，加速了云南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和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进程，当然，也改变了云南几千年来偏远闭塞的历史，对云南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上述情况，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讲，有着一定的必然性，而且有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翻开明清时代的历史，我们不会忽视在社会经济中出现的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地方商帮和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其中著名的有山西、徽州（安徽黄山地区）、陕西、福建、广东、江右（江西）、洞庭（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龙游（浙江中部）、山东十大商帮，而又以晋帮（山西商帮）、徽帮（安徽商帮）最为著名。

在这一时期，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也出现了几大商帮，如“腾冲商帮”、“鹤庆商帮”、“喜洲商帮”等等。与国内的一些商帮相比，这些商帮可能小一些，但却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重要的典型特征，这些商帮为云南的商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中国优良的商业传统和精神提供了宝贵的内容。

这几年陆续播出了以明清商人为原型或以其商业活动为背景的《胡雪岩》、《乔家大院》、《大宅门》、《昌晋源票号》、《驼道》、《钱王》等多部电视剧。其中，《乔家大院》讲的是勤俭持家、注重信用的乔致庸的故事；《大宅门》讲的是同仁堂的前身、专供药于官家的百年老号百草厅白氏家族的兴衰；《钱王》描述了艰苦奋斗、奔波劳累、以德服人的清末红顶商人王炽的传奇一生。之所以专点这三部，不是说这三部最好（当然很好），而是说它们分别讲述了中国三个省份的商人代表，乔致庸是晋商的代表，白景琦是京商的代表，王炽则是滇商的代表。云南商人心系家乡的公益事业，关心国家的命运，从弥勒商人王炽到宣威商人浦在廷、大理商人李琢庵、保山商人梁金山、腾冲商人寸玉亭，他们无不积极投身于社会大潮之中，捐出自己的财产，为社会变革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确实是云南的一大商业精神。近现代云南商业的发展，深刻地影响到了云南各地、各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该套丛书的出版可说是对“百年滇商”商贸遗产做的总结、梳理及研究。尽管我们能力不及，但这毕竟是云南省商务厅及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长期酝酿多年研究的成果展现，旨在缅怀商界前辈、弘扬滇商精神、追思商脉过往、传承滇商文化。丛书对云南经济文化研究，特别是商务文化建设做了一项填补空白的工作，相信该丛书会使更多的人关注滇商的发展。





总序 / 熊清华

第一章 中印商道的发现

- 第一节 张骞的意外之喜 2
- 第二节 中国对外交流有三条通道 7
- 第三节 妙香东渐 13
- 第四节 马可·波罗与徐霞客的行游 17

第二章 茶成为商业符号

- 第一节 茶让世界回甘 26
- 第二节 越陈越香普洱茶 33

第三章 马背商帮

- 第一节 大地蹄印 52
- 第二节 云南山河孕育了马帮商业文化 63

第四章 古道上的坐贾行商

第一节	古道商业网络	72
第二节	茶马古道上的集市	88
第三节	古道商事	100

第五章 普洱茶文化与贸易

第一节	茶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	116
第二节	普洱名茶	127
第三节	普洱茶区的茶叶贸易	134

第六章 茶叶交易的起始

第一节	民间自由贸易	150
第二节	茶叶入藏	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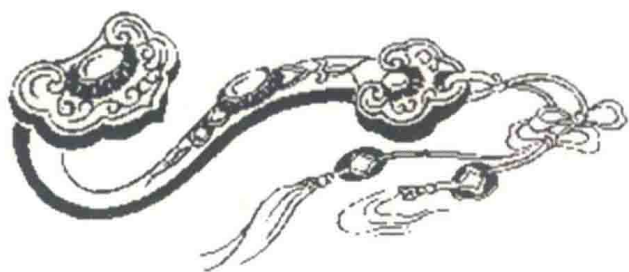
第七章 以茶驭番

第一节	民间交易故道	166
第二节	茶马互市	177

第八章 茶文化边疆

第一节	茶为大钱粮	182
第二节	茶生活共同体的形成	188
第三节	茶丝瓷	196

参考文献	210
------------	-----



第一章

中印商道的发现



第一节 张骞的意外之喜

筇竹杖因《汉书》的记述而声名显赫，它不仅只是一物，而是体现了中国大西南同遥远的印度进行文化贸易的交流，它是一个“符号”，一个故事，一个叙述了二千多年的中印古老商贸的传奇。

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大月氏，在大夏见筇竹杖及蜀布，经详细询问，知道有一条商路从内地四川经云南可达身毒（印度）。

张骞被囚十年之后，回到汉朝，向汉武帝禀报了西域诸国的各种情况，并告诉汉域版图中的云南及四川同印度、波斯有着商贸往来。汉武帝雄才大略，身毒道的发现，引发了其开发西南夷的雄心。于是汉武帝遣四路使臣前往云南寻找“蜀身毒道”也就是云南、四川通往印度的古道，不幸的是使臣纷纷受阻或被杀于洱海区域的昆明。为讨伐阻杀者，汉武帝在长安仿云南洱海外形开凿昆明池演习水兵，从此云南历史上有了“汉习楼船”的故事。

张骞出使西域，确认了云南很早就和南亚、西亚、中亚的交往，而汉武帝遣使者的寻访，让中原接触到了西南边疆的文化。西汉王朝明白，一旦打通这条商道，西方文明将会和中原文化相接相触，商贸、艺术、文化的交流将会有新的通道。



汉代的筇竹杖到了唐代，演化成“赤藤杖”，韩愈有《和虞部卢四汀酬翰林钱七赤藤杖歌》，说的就是钱七从云南回来后，他用南诏藤杖为拐杖，让韩愈这样见识多的人也大



开眼界。赤藤杖、竹索桥、蛮族语……陌生而好奇，可好奇总是相互的，文化就是在相互打量中融合。数点那些稀奇古怪的风物之后，还是回到世俗中最为难得的友谊，爬山涉水，为友人带来一点当地的土特产，这样的情怀，古今不变。

北宋《太平御览》卷九九五引《云南记》云：“云南出藤，其色如米，小者以为马策，大者可为拄杖。”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草七·省藤》（释名）：“赤藤，红藤。”陈藏器注释说赤藤：“生南地深山。皮赤，大如指，堪缚物，片片自解也。”唐白居易《红藤杖》诗：“南诏红藤杖，西江白首人。”自注：“杖出南蛮。”白居易也有《蛮子朝》诗说：“清平官持赤藤杖，大将军系金咭嗟。”在《朱藤杖紫骝吟》里，他说：“拄上山之上，骑下山之下。江州去日朱藤杖，忠州归日紫骝马。天生二物济我穷，我生合是栖栖者。”

现在市面上卖有产自云南怒江中缅边境担当力卡山的红藤手镯，这种红色蔓藤生长在高山背阴坡的悬崖绝壁上，采摘后只能阴干，如果采摘后遇到曝晒，立刻会变成坚硬的木棍而无法加工。据说这种红色蔓藤生长地区周围只要有人居住或有人长期活动就会死亡，因此采制极其困难，因此而显出其珍贵。

西双版纳有一种会流血的寄生植物，叫做鸡血藤，花可供观赏，根可



做药用。韩诗中“赤龙拔须血淋漓”，夸张是夸张，但这样的藤确实存在。

在史料中，从唐朝开始，云南南诏等少数民族部落就用赤藤与中原王朝进行交往，因此云南的赤藤不断地进入到内地。大家从称奇到见怪不怪，最后喜爱也就顺理成章。用云南赤藤制作的拐杖，在中原成为许多士大夫的挚爱，对此韩愈、白居易、张籍、裴夷直、姚合等人都专门写过。

裴夷直《南诏朱藤杖》：六节南藤色似朱，拄行阶砌胜人扶。会须将入深山去，倚看云泉作老夫。姚合在《谢韬光上人赠百龄藤杖》里说：“衰病近来行少力，光公乞我百龄藤。闲来杖此向何处，过水缘山只访僧。”张籍《酬藤杖》里说：“病里出门行步迟，喜君相赠古藤枝。倚来自觉身生力，每向傍人说得时。”他还在《赠太常王建藤杖笋鞋》说：“蛮藤翦为杖，楚笋结成鞋。称与诗人用，堪随礼寺斋。寻花入幽径，步日下寒阶。以此持相赠，君应惬素怀。”

宋代写及赤藤杖的诗文就更多了。也许是“隐喻”传统社会中的文化交流往往都是负载于物质交流之上的，也许从赤藤杖看唐宋与云南之间的关系，这种“物喻”就更有意思。当时，大理国与南宋关系处在不确定中，为此南宋不少官员，拼命找此物，好在浙江找到了新的藤来做杖，但南宋政权终于还是不可挽回地灭亡了。

而张骞的筴竹杖也在历史的长河中得到张扬，历史也在叙述这个伟大商道发现的故事。

中国大西南山高水深，世居于此的人民要战胜自然的阻碍同外界进行各方面的交流，即便是今天，在这些大江高山架桥筑路亦是十分不易之事，但这些区域的早期居民在长期的迁徙、征战、生产、交易等活动中，积累了对这些区域的地理知识，故能找到最适宜“交流”的便捷通道，五尺道、灵官道、博南道等就是因大西南人民不断行走而成的固定通道。方国瑜先生认为，中国西南蜀身毒道的开凿，是这个地区社会经济条件的使然，而且是这地区的居民分段开发的。就是说大西南甲地和乙地之间的民众先开辟了一段路，乙地与丙地之间，丙地与乙地之间，在不同时间里开辟通道，由于经济文化的需求，也如此连贯起来，由此形成了一条漫长的交通线。

这条古道承载着经济文化的交流。到了唐代，随着吐蕃王朝的崛起，藏族和南亚、西亚人大量饮茶，古道的喧嚣前所未有。唐朝的樊绰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云南志》（也叫《蛮书》），书中记载了茶出银生城的情况。



一般情况，茶叶入藏的道路有两条，一是从云南的西部西双版纳、思茅经临沧、保山、大理、怒江、丽江、迪庆到四川的甘孜及西藏的昌都、察隅、波密、林芝、拉萨，再进入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阿富汗。一条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康定到昌都的左贡同云南之道相汇。茶马古道在时间和空间上规模宏大，它是亚洲大陆上庞大的以茶叶为纽带的古道网络。随着茶叶为载体的商贸日趋发达，宋、元、明、清大大强化了这条道路，由此形成了亚洲大陆最为庞大复杂的商业道路。

中国西北的丝绸之路已是名满天下，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到如今有一百多年，但它的显赫是随着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国西部探险考察热而兴起的。

20 世纪 80 年代有一部《丝绸之路》电视片更是让人记忆犹新，一个叫喜多郎的日本人为其谱写的同名乐曲已成为传世的经典之作。在中国的大西南同样有着一一条可同“丝绸之路”相比美的茶马古道。该路概念提出仅十二年，但它已被学术界所公认，此路伴着 20 世纪末人们对中国大西南的开发与探险而广为人知。

茶马古道是当今世界上地势最高的贸易通道。茶马古道连着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贸易带来了城镇和集市的兴起，现在云南的沙溪镇、独克宗



古城，青海日月山下的哈拉库图城，西藏昌都，四川西昌等等，都是因茶马古道贸易形成的。

茶马古道是民族融合与民族文化交流之道，它见证着中国乃至亚洲各民族间千百年来因茶而缔结的情感。藏族史诗《格萨尔》说：汉地的货物运到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

茶马古道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它为人类寻找永恒的家园提供了许多实证。

茶马古道是佛教东传之路，是世界文明的主要通道，在茶马古道上，多元文化开始融合。商品承载着文化，茶马古道同时也是一条宗教道路，教徒与商人相伴而行，为这些区域带来了不同的信仰。比如通过藏传佛教在滇西北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纳西族、白族和藏族的经济及文化交流，增进了几个民族之间的友谊。

茶马古道是重要的军事政治通道。吐蕃南下，沿途修道，建神川铁桥而通南诏，带来了政治、文化、贸易的多种影响，不一而论。自吐蕃始，历代军事都离不开茶马古道，宋末，蒙古三路大军南下进攻大理国，也是沿着茶马古道；清代五次讨伐西藏叛军，都是从茶马古道进入；此后，茶马古道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印边境斗争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茶马古道是探险旅游者的乐园。无论是从马可波罗到徐霞客，从卜弥格到罗伯特·福琼，从德拉波特到斯诺、洛克，还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茶马古道六君子以及当下无数的朝圣者，都为茶马古道深深倾倒。

第二节 中国对外交流有三条通道

中国对外交流有三条大通道，北方有丝绸之路，南方有茶马古道，在海上有瓷之路北方丝绸之路东起渭水流域，穿过河西走廊，沿新疆的塔里木河南北两岸西出，越过葱岭，经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大月氏（今阿姆河上、中游）到马里，再经里海东南的达姆甘抵哈马丹、巴格达，再由地中海东岸各地转达罗马。这条古道起于公元前二世纪左右，以丝绸为主。

在这些古道中，最长的要数茶马古道了，所谓最长是指：其一是里数最长；其二是历史最悠久。能把茶与马这两个不同的物种联系在一起的是人，是人类的活动，是人类的交往、交流和商贸活动，是人类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易茶的茶马交易活动。

以文成公入藏送茶叶为茶马古道开通年，文成公主献茶叶而使藏“中国化”。茶马古道有礼制文明和商品经济的双重任务。茶马古道的命名不以西方为中心来命名，表现的不是西方人的要求，我们站在中国化的立场，即表达了礼制文明的理想，也传达了以政治羁縻和商品经济抚边的实际功能。历史上，茶为中国独有，形成独具特点的“温，良，恭，俭，让”之茶礼。“马”乃马匹，“古道”乃纵横于中国大西南江河山峦中的各种道路，“茶马互市”就是中国封建制下产生的一种“羁縻”政治。如果我们结合起来看，“茶马古道”也就有了世界眼光，也就在世界史中有看点。茶现今仍鲜活着生命，从“物”的影响来看，仍是中国生活方式的世界影响。

茶马古道是一条险峻而漫长的，完全由人和马的脚力踩踏出、用生命的血肉之躯铺就的山间小道。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



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施展。”

“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

茶马交易，最早出现于唐代，但直到宋朝才成为定制。宋朝统治阶级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



市”？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护宋朝的边疆安全。宋朝初年，内地用铜钱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这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宋朝的边疆安全，因此，宋朝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这就是茶马互市的源起。

而且，茶马互市也是中央政府羁縻边境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经济手段。由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藏族等少数民族对茶叶十分依赖，茶能解毒去病，可以解油腻、助消化，因此，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等于控制了藏族人的生活，所以，茶叶自宋以来不但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藏族之间的大宗经贸产品，而且也成为与藏族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手段。

“茶马互市”对维护宋朝在西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是两宋王朝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治边政策。同时，通过茶马贸易，还满足了封建王朝对战马的需要，又为朝廷提供一笔巨额的茶利收入解决军费之需。

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王朝边疆。到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等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清代，尤其是乾隆以后，“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